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

ZHONGGUO
XIEZUOLILUN
JIPING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当代部

UNJIPING

H152/208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中国写作
理论辑评

当代部分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1242147



21242147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当代部分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625 字数：400 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120册

ISBN 7-5311-1466-6/G·1274 (压膜) 定价：6.50元

整理中國古今有聲寫
作的理論以及外國的
有關資料，這對於寫作
學的建立與寫作實踐，
都是大有裨益的。

臧克家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于北京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顾 问 臧克家

主 编 刘锡庆

副主编 王志彬 松 迪 蔺羨璧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彬 刘锡庆 任公伟 任文贵

朱宝恒 李保初 佟德真 林三松

松 迪 胡志霄 郝季光 曹玉梅

温中和 甄 瑛 蔺羨璧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当代部分

主 编 蔺羨璧

副主编 佟德真

执笔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平慧源	张少俊	张绪强	佟德真
林 萍	赵世杰	高其珍	徐新民
阎 泽	蔺羨璧		

总 序

刘 锡 庆

不论是眼光敏锐者还是感受迟钝者，现在都已不难看出：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文章，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青睐；写作，作为信息的制作，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重视；“写作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勃然兴起。

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的“大趋势”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创造了古代东方灿烂文明的炎黄民族的子孙，站在历史发展的这一重要关口上回顾、思索，真有万千感慨！我们这个闻名于世的文章泱泱大国，近两千年来走过的恰恰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留下了一个明晰的“之”字形足迹：由“经国大业”、“以文取士”一变而为“声光化电”、“重理轻文”，这是一次重大的激变；再由此演化为“信息社会”、“文字密集”，这是目下正在进行中的、更为深刻的另一次转化。转化，即后者对前者的积极的扬弃与否定。每一次转化，固然有旧亡的痛苦，但更多的则是新生的欢乐。历史，正是在这转化与否定之中开辟着自己不断前进的道路的。

在信息社会里“文章”的写作既然作为“信息之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文章写作的深入、细密研究就成了客观的一种需要。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提出并开展起来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问题确实不少。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闭目塞听，观念陈旧，不思进取；抄来抄去，辗转相袭，未下功夫；一知半解，急于趋新，

不能“实战”；轻视传统，疏于学习，没有“根基”。因此，写作的书出的实在不少，但相当一部分尚较平庸。所以，目下之急在于摸清“家底”，弄明“现状”，放眼“世界”，切实地做好学科建设的“奠基”工作。如果对写作的历史和现状“一团漆黑”，对本国传统和外国情况“若明若暗”的话，那么，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势必会成为一种动听的空话。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为着写作学科理论“奠基”的目的而编写的。

它的阅读对象仍很广泛。因为，文章的写作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能离开的。写作能力的获得几乎是现代人“自我完善”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教学和研究者不必说了，要想尽快地提高他们的业务素养、研究能力，舍此实无它途；专业作家或业余写作者也是应当掌握这些知识的，这是他们克服“非学者化”缺欠，提高创作水平、境界的努力方面之一；在校大学生、成人自学者、中小学语文教师、自学写作青年等等，也都需要了解这些内容，这对他们在各自基础上提高写作水平，乃至开阔眼界、活跃思维、增长知识、做好工作等，都是大有帮助益的。

丛书计有五册：“古代”写作理论的辑评，由河北写作学会负责；“近代”由内蒙古写作学会负责；“现代”由山西承担；“当代”由天津完成；北京则负担编辑“国外”写作教学概况的专册。华北地区三省二市写作界的同仁自己发起、自愿联合，分工协作，工作得十分努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从上到下鼎力相助，使丛书得以顺利的编辑、出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本书顾问、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臧克家同志，始终关心丛书的编辑工作并慨然为之题辞；著名学者、中国书法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以上所有为本书问世做出了劳绩的同志，我在这里表示深挚的感谢！

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夜。这是中国历史

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洪流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世界文化中心的东移、“华夏文化”的重放异彩，其指日可期是定而无疑的！

在这个辉煌历史潮头中做出成绩的，将不是那些浅尝辄止者、沽名钓誉者、华而不实的“风头”人物和有勇乏智的“勇敢”分子，而是那些踏踏实实、沉稳执着、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实干家。

我们愿为他们铺路、架桥！

愿为“写作学”大厦的构筑填砖、加瓦！

1988年元月24日

于北师大寓室

前言

蔺羨璧

中国当代写作理论经历的艰难曲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写作理论发展史上罕见的。总结其成败得失，大体可按照“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新时期三个不同阶段加以审视。十年是“窝里斗”，大动乱，写作理论遭到毁灭性破坏。这个“前言”，将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十七年”和新时期。

一、当代写作理论发展的轨迹

十七年期间写作理论的发展，可以用“三起”、“三落”加以概括。写作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与来自“文艺从属于政治”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构成了这种“起”、“落”的矛盾交点。

1. 从开国到1955年反胡风。这一时期，文学写作理论，引人注目，基础写作理论亦有所开拓。

新中国成立，举国振奋，蓬勃向上，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因此，一些有见识的理论家，便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写作理论做出新的选择。首先是意识到“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主张，已经不能适应和平建设时期写作理论发展的需求。对这个问题最敏感的是胡风。他在《关于解放以来实践情况的报告》^①（以下简称《报告》）中批评那种由于过分热衷于“文艺为政治服务”而要求作家“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和“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的形而上学的左倾倾向，无疑是击中了时弊的。但又不能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把世界观和思想改造与写作实践对立起来，固然

^①《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

要束缚作家的手脚，可在那个“一切刚刚重新开始”的时代，又不能不提醒作家，为要写出无愧于新的时代的作品，在生活和写作的实践中重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萧殷的结集《谈写作》^①，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时代的要求。它的中心思想是强调生活，强调艺术技巧，更强调“活得伟大，才能写得伟大”的思想。此外，何其芳的《论民歌》^②，也是有建树的著述。其时基础写作理论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何家槐的《作文讲话略稿》。它打破了“文选及习作”的建构模式，是“八大块”的奠基之作。

1955年反胡风，把《报告》中对文艺问题的主张，判为“反人民的文艺纲领”，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给当代写作理论的发展设置下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刚刚勃发起的理论建设热情，受到了第一次挫折。

2. 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一时期，文学写作理论，有进一步突破。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我国以和平的方式，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就是适应这种社会的和文化的需求，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毛泽东便于本年5月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在这个方针的鼓舞下，文学写作理论，果然出现了争鸣的势头。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③，主张最大限度地拓展“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这对那种因受政治约束而显得极为蹙脚的现实主义理论无疑是一种修正。巴人的《论人情》^④，运用列宁的观点，强调人情是人类共有的“要求、喜爱和希望”，有助于冲破文学上的狭隘的“阶级论”的束缚，拓宽

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何其芳选集》第2卷。

③《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④《新港》1957年第1期。

写作的题材。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①，强调文学描写的对象和目的，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不应该是所谓“整体现实”，反对用人图解“整体现实”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倾向。这三篇文章都是有感于左倾教条主义对文学的干预而发的。此外，秦兆阳的《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②主张还应该有一种“对于真人真事作适当的有益于真实性加工”的特写，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和争议。

可惜，这次争鸣，也实在为时太短，很快就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导致了类似反胡风那种失误的又一次重演。何直、巴人、钱谷融等，通通被打入另册。写作理论的发展，又一次遭受更为严重的挫折。后来的关于新民歌与新诗歌创作问题的讨论，也是以否定“创作需要才能”告终的。

1958年在全民写诗的狂潮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主张。其时，由于一些人被“升虚火”的迷雾遮住了眼睛，竟然把颂扬“大跃进”的新民歌误认为“两结合”的典范，并赋予其对新诗建设的决定性意义。而何其芳则力排众议，在《关于诗歌的百花齐放问题》^③和《关于诗歌形式问题和争论》^④中，主张建立一种新的格律诗，并强调“扩大眼界”和采取“拿来主义”的必要性。这种用较为开放的眼光看待新诗的发展，对想以民歌体定于一尊的理论，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论争。但因只局限在形式上，未能触及这场新民歌运动的深层弊端。真正击中其要害的，却是吴雁的《创作需要才能》^⑤。这篇短文，针对那种把不是诗的“新民歌”鼓吹为诗的狂热，提出了创作需要才能的论点。结果仅仅由于强调了文艺创作规律，

①《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②《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④《何其芳选集》第2卷。

⑤《新港》1959年第8期。

揭露了文艺上“大冒进”的危害，遭到了和何直、巴人、钱谷融等同样的下场。因此，这场关于新民歌和新诗发展道路的“争鸣”，只不过是证实了“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①

3. 从周恩来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②到文革。这一时期，基础写作理论，有所发展，文学写作理论，明显削弱。

周恩来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党的八字方针出发，针对反右派以来文艺上左倾思潮的泛滥，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对文艺的横加干涉，反对“五子登科”，提倡发扬艺术民主，自由选择题材，尊重艺术规律，重视写作技巧等等。这是一个解放文艺生产力，重新张扬理论权威的《讲话》，给写作理论的建设，又投射了光明。

1958年，各大专院校，将“文选及习作”改为“写作”课。适应这种教学改革的需求，胡淑文等编写的《写作基础知识》^③（原用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写作教研室署名的《写作基础知识》修定本），提出了“基础写作”的命题，和何家槐的《作文讲话略稿》相比，有所丰富，有所前进。后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教研室编写的《写作知识》^④和《写作基础知识》相比，更加系统化，完成了“八大块”的结构框架，是“十七年”中集大成的基础写作理论著述。

在文学写作理论建设上，赵树理的《谈“久”》，强调深入生活对写作的重要意义，在张扬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理

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

②《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④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论方面，有代表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邵荃麟对维护现实主义写作原则所作的最后努力。在大连会议上，他提倡“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反对浮夸的浪漫主义和写人的单一化，主张“写艰苦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①。这些主张，无疑是击中了时弊的。此外，茅盾的《关于艺术的技巧》^②，杨朔的《东风第一枝·小跋》^③和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④等，都对探讨写作理论有启迪意义。然而，相对而言，即使像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也只是强调了一个拓宽题材的问题，和胡风、何直、巴人、秦兆阳的那种理论相比，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芒。这不能怪邵荃麟。因为1962年就强化了阶级斗争，并加快了文艺上“反修”的步伐。以后就是大批写“中间人物”。特别是毛泽东的错误估计文艺界形势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左倾的高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往后，人们看到的就将是十年动乱对写作理论的彻底背叛。

显然，这三次大的曲折，都是由于没有解决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所造成的。

粉碎“四人帮”，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关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重点的转移，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变革中，写作理论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老大难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发难的是《戏剧艺术》和《上海文学》，先后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⑤和《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⑥，旗帜鲜明地批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产物

①见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

②③④见有关选评。

⑤陈恭敏：《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

⑥评论员：《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工具论，就是直面文艺的这种自发要求。1980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①，为当代写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真正的转机。于是，才有“双百”方针的贯彻，才有写作理论对自身建设的科学思考，才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才有对有关变革写作理论的观念、方法和文体诸方面的探讨。然而，作为一个过程，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那种曾经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特别是1985年以后，由于受到西方的政治、哲学、美学和艺术思潮的袭击而引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加以认真抵制，致使我们今天清除这方面的污垢，还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自由化”的鼓吹者，在写作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否定毛泽东的“讲话”，否定民族的文艺传统，搞“全盘西化”。但这毕竟是一股前进中的逆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写作理论所进行的尝试，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回忆这一段发展历程，文学写作理论，走在前面。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②，王蒙的《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③，徐敬亚的《〈诗，升起了新的美〉——评近年来诗歌艺术中出现的一些新手法》^④和后来的关于文学主体性论争的许多著述，经过优化互补的选择，均有助于拓宽写作理论的观念、思路及构建模式。就是在这种文学写作理论的探求精神影响下，基础写作理论、新闻写作理论、文章学理论，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建树。

从宏观看，首先是审美视角和方法论的突破。即：不但重视道德的评价，还重视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不但重视社会、历史的批评，还重视审美的观照；不但重视对故事的平面剖析，还重视对

①《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

②《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③《文艺报》1980年第9期。

④《诗探索》1982年第2期。

人物复杂心理的立体开掘；不但重视对线性因果关系结构的认同，还重视对开放性结构程式的探索……从而发展和丰富了现实主义，并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及荒诞派手法也作出了互补与优化的选择。

从微观看，有关小说的诗化、意象化、感觉化、象征、变形、文体、语言的理论；有关诗歌的内向性、理性思辨、意象组接、流动美、抽象美的理论；有关戏剧的“整合”治理、剧场效验、摒弃单一的“高台教化”，强调寓认知于审美的自我启迪和突破台词主宰一切的理论；有关电影和戏剧分家、电影美学、电影造型的理论；有关散文的“人格的诗化表现”、“再现式的、表现式的、哲理式的、现实式的、幻想式”的理论；有关报告文学的审美尺度、启蒙意识、文体的“杂交”，“全景的、局部的、问题的、人物的”理论；有关文学批评的文体应大大解放，可以采用“意会的方式、印象的方式、自由联想和借题发挥的方式、感情共鸣与扩展开拓的方式和那种科学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乃至统计与制表方式”的理论，等等，构成各种文体写作理论所关注的热点。

基础写作理论，和十七年一样，各大专院校的写作课教师仍是这一时期从事这方面的理论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写作学会的成立，《写作》杂志的问世，特别是老一代革命家邓颖超等对振兴写作学科的期望，极大地鼓舞了写作理论家振兴写作学科的雄心壮志。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写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赋予“写作学”这一命题，打破了旧有的基础写作理论“八大块”的构造模式，对中国写作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林可夫主编的《基础写作概论》，开辟了通过“智能”训练提高学生实际写作能力的途径。李景隆的《应用写作》，把论说文归入应用文体，恢复了“文字之文”的传统，扩大了当代应用写作研究的范围。张寿康主编的《文章学概论》，在众多

文章学专著中，有一定代表性。还有，在中国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写作》上，常有勇于探求之作问世。青年写作理论家，是我们的期望所在。

总之，追踪写作实践，写作理论家们注意了对传统写作理论的继承与改造，对外来写作理论的借鉴与融化，对相邻学科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吸收，从而，构成了新时期写作理论发展的鲜明特点。

通观上述，总结四十年来写作理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集中在一点上：重要的是处理好政治与写作理论的关系。实践证明倘若政治对写作理论形成束缚，写作理论就要滑坡；倘若写作理论脱离了政治，写作理论同样会误入歧途。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千万要记取。

二、总结当代写作理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给探讨写作理论发展规律提供的启迪意义。

1. 主体意识的觉醒

胡风不但对政治干预文艺的消极影响较为敏感，而且对弘扬写作的主体意识也有独到的见地。他在《报告》中所申诉的那些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其核心就是张扬作家的“个性或主观精神”。尤其可贵的是，他张扬作家对“对象”的“突进”、“搏斗”、“吸来”、“生发”，不是为张扬“个性”而张扬“个性”，而是为了最充分地开掘“对象”的“潜在的内在逻辑”。这种“对主观在客观现实中燃烧的理论，拥抱现实的理论，充分估计到主体意识的张扬在把握现实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①这种建筑在主客观矛盾统一基础上的张扬写作个性的理论，是与那种机械的反映论和主观唯心论不可同日而语的。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①王愚：《无边与有限——关于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6期。